

敬告钟长鸣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傅明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警 钟 长 鸣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傅 明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警钟长鸣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傅明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汉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1 插页 264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9-6317-8/D·80

定价:18.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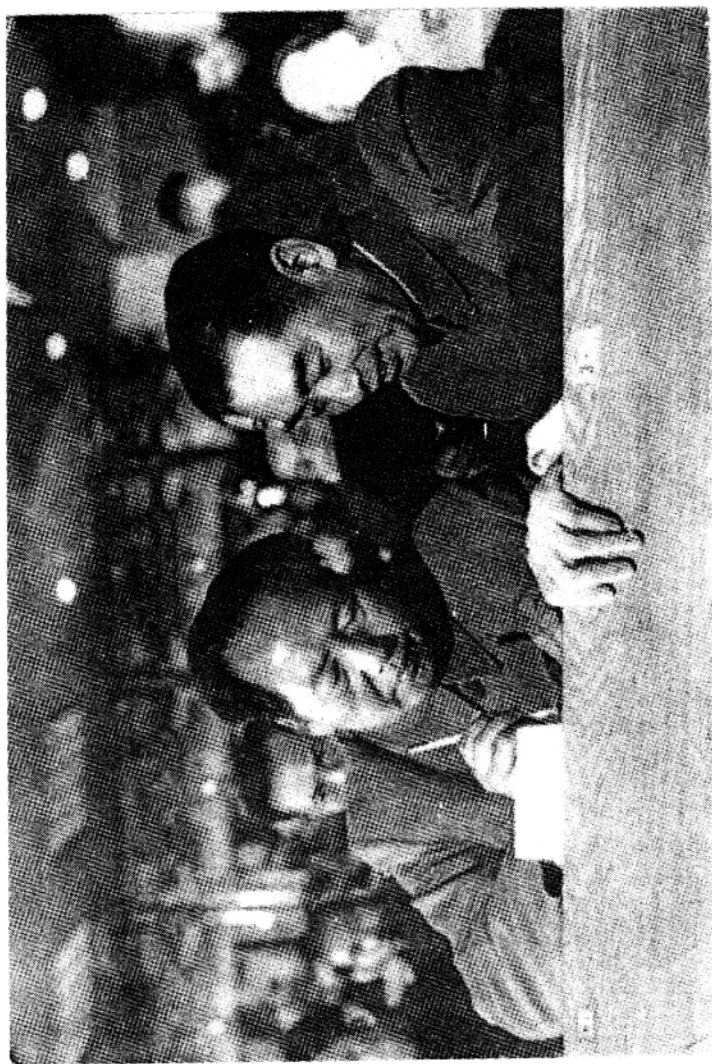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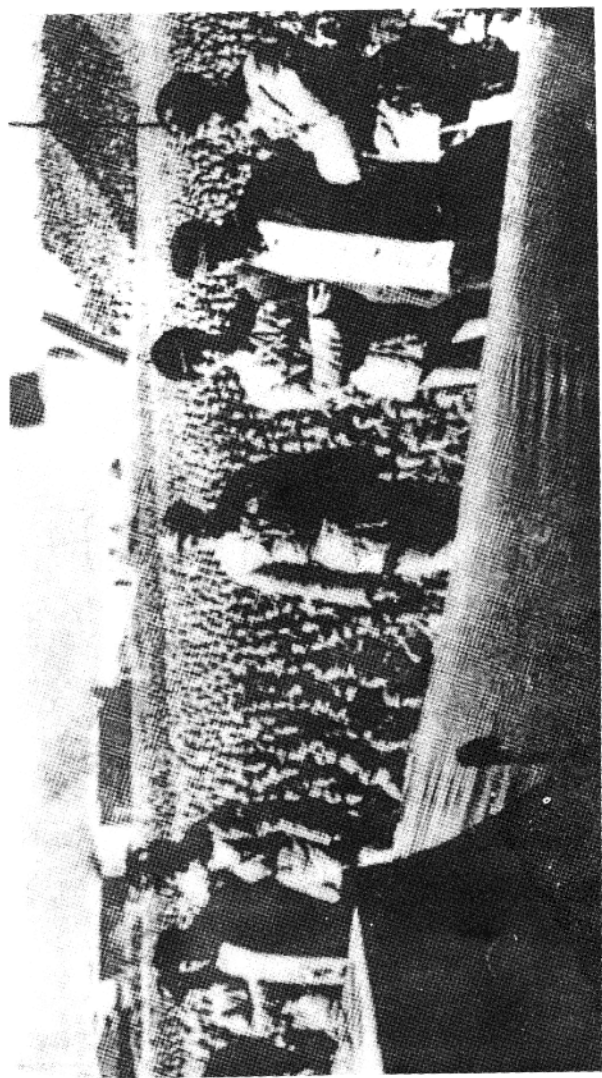
厂址:陕西省汉中市将坛东路 108 号 邮编:723000

电话:(0916)2224004

陕西省教委专项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毛泽东同志在写选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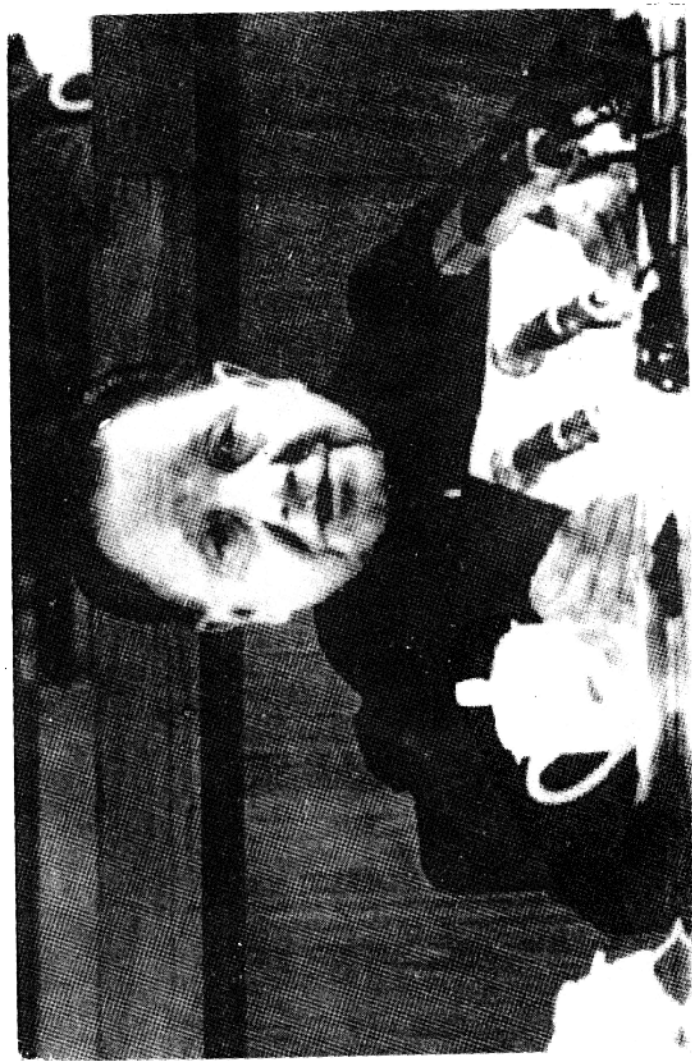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以贪污罪判处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前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死刑。



1998年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亲赴长江抗洪第一线慰问广大军民。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整党——端正党风的重要讲话。

序

刘炳琦

再过一年多，人类就要跨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历史重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认识。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一直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他在 1977 年重新恢复工作后的首次讲话中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不断引导全党认识反腐败斗争的严重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在党的十二大前夕，他指出：“不坚决刹住部分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①。1989 年 9 月，他又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②在 1992 年南巡谈话中，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党的十五大更明确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7 页

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我们党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是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系到能否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能否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党的事业全局的高度，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重大意义。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是历史上私有制社会遗留下来的。从理论上讲，党的性质和宗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不可能产生腐败现象，也同任何腐败现象不能相容。但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既不是没有任何微生物的真空，也不是尽善尽美、纯而又纯的理想王国，我们党是在一种极端复杂的社会现实环境中诞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各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党的肌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和党员，在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下，容易出现腐化堕落行为；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备需费历史时日，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某些不协调乃至无序状态，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我们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一些西方的消极东西。由于上述滋生腐败现象的思想根源、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加之权力的负效应和市场经济的负效应的影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就很难避免。

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教育党员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向全党专门发出了清洗贪污分子的通告，未得政权，先敲响防腐的警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民主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新思

路。在全国解放前夕，又及时提出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方针，为党执政后的廉政建设作好了思想准备。广大党员和干部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克己为民、廉洁奉公，党领导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一片净土”，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吏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的做法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中国共产党饮誉中外，博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仰慕，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更加重视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和干部继续保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于党内出现的贪污腐化分子，坚决予以惩处。建国初开展的“三反”运动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57年以后的20年里，我们党重视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是一贯的，只是指导思想发生失误，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出发，根据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要求，先后部署了端正党风、整党、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等工作，并提出了注重查办大案要案和坚决持久地反对腐败的战略方针，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确定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体制。1997年颁布的《廉政准则》把党员干部从政行为规范为6个方面“31个不准”，为廉洁从政提供了行为准则。广大党员干部逐步加强了廉洁自律，从中央到地方查处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遏制了行业不正之风蔓延的势头。应当说，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有的方面还有蔓延和发展之势。总的看，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对此还很不满意，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对腐败现象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要“标

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就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抓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思想上构筑抵御腐败的坚固防线；抓法制，健全和完善机制、体制和法制，用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的发生；抓监督，把建立内部制约机制和政务公开，实行群众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营造防范腐败现象滋生的良好氛围；抓改革，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体制的转轨换型，逐步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可见，教育、法制、监督、改革这四者都是防止发生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为因果，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四个方面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合力，才能有效的治理腐败现象。只要坚决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不懈的开展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搞好反腐败斗争。

这些年来，针对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态势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艰巨任务，理论界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撰写了一批有相当份量的论文和著作，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广大理论工作者仍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强研究，为反腐败斗争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对策。《警钟长鸣——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作者们，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并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毫无疑义，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有意义的。我祝贺本书的出版，并对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

1998年10月

前 言

党风廉政建设——这是一个凝重而严峻的话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腐败之风的盛行，必然导致政权的丧失、国家的衰落甚至灭亡。

在人类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漫长的岁月记载着令人欣慰的文明与进步，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遗憾。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古希腊、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曾经创造出光彩夺目的辉煌而雄居全球。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古巴比伦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成为匆匆而去的历史过客，印度曾被欧洲列强霸占沦为殖民地达百年之久，以至于研究这段历史，需要借助外国史料来作为印证。在中国，一部近代史，同样是一部被西方列强凌辱的血泪史。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人们不能把历史上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完全归咎于政权的腐败，但毫无疑问，腐败则是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正所谓：天下兴亡多少事，自身腐败遭厄运！

就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而言，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开始，中经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清，一个个王朝，一代代封建统治阶级，不管起初如何，但后来无不是因为腐败而归于覆灭。正如江泽民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所指出的：“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分不开的”。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这种腐败现象越演越烈的历史写照。可以说，专制主义的封建宗法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最适宜于腐败滋生蔓延的大温床。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尤其是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更是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几百年来，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和政权的联姻，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原本就属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产物的腐败现象。从老资格的英国，到被称为“暴发户”的美国，到后起之秀的日本，再到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腐败现象犹如不可遏制的癌细胞在广泛扩散。震惊英国朝野的“波森”公司行贿案、美国的“水门事件”、法国的“发展路口”案、德国弗利克康采恩集团行贿案、意大利的“米兰丑闻”、日本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受贿逃税案、韩国总统全斗焕及其家族营私舞弊案，如此等等，正是这种腐败现象的缩影。而这种腐败现象导致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意大利的天民党和日本的自民党了。

在意大利，于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天民党，党员人数曾一直保持在130~170万之间，一向以第一大党的身份执掌全国政权，在政府和议会中起主导作用。然而，随着掌权日久，腐败也逐渐发展起来，及至八九十年代，腐败之风越刮越凶，其深度和广度同其他西欧国家政党相比都是屈指可数的。该国一家报纸在评论中说，腐败活动已使意大利变成了一只“爬满蛆虫的烂苹果”。1992年，天民党终因政治丑闻的冲击而陷入危机，虽苦苦挣扎一年，但回天乏术，1993年7月遂宣告解散。

在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起，曾连续执掌政权38年。日本从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自民党可谓功不可没。但政党、金钱、权力的密切结合，导致日本政坛丑闻倍增。1976年，在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中，首相田中因受贿5亿日元而经历了长达19年的审查；1988年，里

库路特公司股票案，受贿者包括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自民党干事长安培、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许多要员，竹下首相被迫引咎辞职；1992年，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受贿逃税案发，长期积聚的对自民党的不信任也由此点燃了导火线。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独掌政权38年的自民党未过半数而沦为在野党。

事实告诉人们：执政党在公共权力运作中的腐败，必将丧失人心，从而将断送这个党的前程。这一结论不只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

从本质上讲，无产阶级政党是先进的、革命的政党，她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其发展尤其是执政过程中，党内也会出现某些腐败现象，弄得不好，历史性的悲剧不是不可能发生。

人们不会忘记：1991年8月25日，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在这一天宣布自动解散，不但告别了独掌政权70余年的政坛，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在国内迅速土崩瓦解，而且苏联也由此走向解体。与此同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剧变，共产党纷纷改旗换帜、更弦易辙。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纵然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深蕴着人民对现状的不满。这其中，能否说不存在党风政风腐败的阴影呢？尽管程度不一，但许多事实却是令人震惊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仅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一人专权，全家当官。据统计，齐氏家族在罗马尼亚党政部门担任各种要职的不下数十个，其中任中央委员的就有六七人，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党、政、军、财大权。这种颇有中世纪色彩的“家族权力中心”局面，在当今世界哪有不垮台的呢？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无论是皇权政治时代，还是政党政治时代，政风、党风中不断出现的腐败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政党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重负。无视它的存在，便是无视国家和政党的未来。

腐败的东西最终要走向灭亡，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腐败现象决不会自行消亡。腐败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相当顽固的力量。发生在当代中国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伴随历史车轮不断滚动的一个巨大阴影的伸展。尽管其发生的原因和作用环境与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乃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人类政治史上的古老的顽疾所展开的殊死较量。要么是新的制度切除历史上的毒瘤，要么是历史上的毒瘤腐蚀掉新的制度，两者绝不存在和平共处的空间。

因而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

事实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反腐倡廉便早已成为历史的命题，并为世界各国所关注。

在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即使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者，但在主观上也不希望他的群臣百官都是腐败者，也都要求群臣百官个个成为“清官廉吏”，并相应制定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朝纲法纪”，必要时还施以重刑治吏、重刑惩贪。清官廉吏的出现，对于稳定政局、社会整合、安定民心、发展生产，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康乾盛世”一直为人们所乐道，包拯、海瑞至今为世人传颂。

当然，这种清官政治毕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人治原则的一种体现。“清官”再清，体现的也只是个体的素质，在封建社会，永远不会转化为全社会普遍的、持久的实践，因而，清官政治不可能消除社会的弊端。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反腐倡廉在由人治迈向法治的台阶上前进了一大步。其较为成功的一着，就是近现代文官制度（又称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继英国 1855 年确立这一制度后，美国在 1883 年通过《文官制度法》，奠定了美国

现行文官制度的基础。日本明治政府于1885年颁布《官吏纲要》，1893年制定《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确立了以考试任用高等文官的制度。各国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于防止执政党滥用权力，遏制腐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可以说是它的又一特色。在这些国家中，政治腐败行为被传播媒介揭露出来的为数不少。1975年，联邦德国自民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等人受贿13万马克的“莱茵河水门事件”，就是《明镜》周刊首先揭露的。1938年，日本里库路特受贿案，也是由《朝日新闻》诉诸公众的。1983年，英国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引咎辞职，同样源于新闻媒体对其风流韵事的爆光。舆论监督，对于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震慑的力量。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反贪肃贪制度等，从社会运行机制角度讲，对于权力制约、防腐反贪，也都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同名称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政党活动的背后，无不受制于金钱杠杆的操纵，因而这就决定了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也无论资本主义的法制多么完备，惩腐反贪表面上搞得多么绘声绘色，但实际上都不可能彻底，且往往带有一种私利向另一种私利挑战的性质。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根本不可能消除腐败。并且在当今世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更使得腐败获得了空前的张力。资产阶级在向国外输出资本、技术的同时，也在输出腐败，等于给腐败的蔓延插上了翅膀。

由此说，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一方面表明了反腐倡廉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讲，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说明，剥削阶级社会尤其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反腐